

儿歌中的民俗与欢乐

儿歌,又称童谣,是自古至今流传下来的“口头文学”,亦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。儿歌是一种形式短小、语言简单、适合儿童心理和行为的歌谣。儿歌有孩子自编自传,亦有成人拟作编造的借孩子的口来讽喻时事的。

儿歌是口头文学,但也是民俗,而且是很重要的民俗。有些民俗能流传至今,与儿歌、民谣的世代传唱有关。像记述春节民俗的“小子小子,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“廿三糖瓜粘,廿四扫房子,廿五做豆腐,廿六炖锅肉,廿七宰公鸡,廿八把面发,廿九蒸馒头,三十晚上熬一宿,大年初一扭一扭”等,虽各个地区传唱内容细节略有出入,但已经成为春节民俗的经典,将春节前后所有的民俗生活都概括进去了。

节日民俗是很多彩的,农历二月二日是“龙抬头”的好日子,故而有了“二月二,接宝贝儿;宝贝儿不来掉眼泪儿”;清明节时小孩子会唱“杨柳儿活,抽陀螺;杨柳儿青,放空

钟;杨柳儿死,踢毽子;杨柳儿发芽儿,打拔儿”。有趣的是这首儿歌在五百多年前《帝京景物略》中就有记载。

端午是我国民俗的一个大节,到处搭台唱戏,自然热闹非凡,而看孙子、孙女或外孙子、外孙女的老人不能去凑热闹,只能从孩子身上寻找快乐:“拉大锯,扯大锯,姥姥家,唱大戏,接闺女,请女婿,就是不带小外孙儿去,叽里咕噜滚着去。”如果真是乡里唱了大戏,不会不带孩子去的,这首儿歌是老人哄孩子时唱的,表现着天伦之乐。

七月十五是中元节,老北京有夜晚点莲花灯的习俗,因为这个时期正是什刹海等水塘荷花盛开的季节。莲花灯只能玩一个晚上,孩子们便唱出了:“莲花灯莲花灯,今天玩了明天扔”,惋惜岁月的消逝之快。中元节也是悼念逝者的日子,而莲花灯“今儿玩了明天扔”使人联想起生命像莲花一样短暂,有一股淡淡的哀愁。

一年四季的民俗节

日,都会有相应的儿歌出现。冬至后,小孩子乃至大人都会念叨“三九歌”。“三九歌”虽是儿歌,是将冬至后的温度变化和物候表现编成了歌谣,而且有科学性,故久唱不衰,流传了数百年。至于小孩子最爱听老人唱着吟唱:“水牛儿,水牛儿,先出犄角后出头儿。你爹,你妈,给你买了烧羊肉……”水牛儿是一种有壳的昆虫,北京人也有人称它为“水妞儿”。烧羊肉是夏季美食,当年以隆福寺白魁饭铺的最佳。

有一首很悲凉的儿歌,吟唱起来悲悲切切。这种儿歌被谱成了曲,成为河北、北京一带流传很广的民歌,即不少人所知的《小白菜》:“小白菜儿呀,地里黄呀!三岁两岁,没有了娘呀!好好跟爹爹过呀!就怕爹爹续后娘呀!续了后娘三年整呀!生个弟弟,比我强呀!弟弟吃肉,我喝汤呀!拿起饭碗泪汪汪呀……”这首儿歌女孩子最爱唱,尤其是部分与后妈一起生活的小孩,无论男孩女孩,唱时都会泪

流满面。后来《小白菜》的曲调成为歌剧《白毛女》中《北风吹》的主要调子。

大多数儿歌是欢乐的,充满生活情趣和朴实的爱。住在大杂院里的孩子,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“孝道”的教育,当然是潜移默化的教育:“小板凳四条腿,我给奶奶嗑瓜子。奶奶嫌我脏,我给奶奶做碗热片汤,奶奶说我没搁油,我给奶奶磕仁头”。语言简单但意义深刻,表现出晚辈对长辈的热爱和尊重。

女孩们大多文静,不像男孩可以在胡同里跑来跑去,玩什么“官兵拿贼”、扇洋画、推铁环跑,她们喜欢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玩“抓包”等游戏,五六岁的小姑娘两人一组“拍花巴掌”,并唱着“拍花巴掌呀,正月正,老太太爱看莲花灯;拍花巴掌呀,二月二,老太太往家接宝贝儿;拍花巴掌呀,三月三,老太太爱吃糖瓜粘;拍花巴掌呀,四月四,老太太爱逛隆福寺;拍花巴掌呀,五月五,老太太爱打太平鼓;拍花巴掌呀,六月六,老太太爱吃肉;拍花巴掌呀,七月

七,老太太爱养大公鸡;拍花巴掌呀,八月八,老太太爱把面来发;拍花巴掌呀,九月九,老太太爱喝雄黄酒……”寓教于乐,在游戏中将老太太的爱好全说出来了,因要合辙押韵,有些并非合乎民俗生活内容。当女孩子在拍花巴掌时,淘气的男孩子则玩“招兵”游戏,他们排起队在游戏中唱道:“是我的兵跟我走;不是我的兵,拿屁崩,崩两半儿,换洋取灯……”当年,胡同里几乎没有汽车,是小孩子们的欢乐天地,可以大张旗鼓地“招兵”取乐。

小孩子是天真可爱的,他们也关心大人的事,在夏天麦收时节,小孩子们就唱出:“老天爷,求求你,麦子熟了别下雨,打下麦子都归你……”流露出孩子们也是大人们的美好诉求。孩子毕竟是孩子,他们也会玩:“叮叮当当,海螺烧香。粗米细米,放屁是你”的游戏,但没有任何恶意。

儿歌以欢乐的、有趣的为多:“数一数二数老张,老张的媳妇会打枪,枪对枪,杆儿对杆儿,不多不

少十六点儿”,“金箍勒棒,烧热炕,爷爷打鼓奶奶唱,一唱唱到大天亮……”,“小三儿,小三儿,骑着骡子卖杏干,骡子放了一个嘟噜儿屁,崩得小三儿二里地。二里地,下雹子,单打小三儿后脑勺子”。这些儿歌在今天没有多少人说得上来了,留下了遗憾。跳皮筋今不多见,当年在胡同里、院子里跳皮筋的女孩都成了“北京大妈”,而她们那时边唱边跳的经历是忘不掉的,也会记得“小皮球儿,香蕉梨,马兰开花二十一,二五六,二五七,二八二九三十一……”,既是游戏,又增加了数学知识。至于“大头大,大头大,阴天下雨不害怕”和“大脚好,大脚好,阴天下雨滑不倒”,不止逗笑,还安慰了头大、脚大的孩子。

欢乐色彩的儿歌,有许多内容表现了老人对孩子的关爱:“剃头打三光,不长虱子不长疮;剃头打三下儿,不长虱子长小辫。”“胡噜毛,吓不着,揪揪耳,吓一会儿”,更是爱意的表现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从大唐东市说起

大唐长安城设有东市、西市,分别位于唐长安皇城外的东南方和西南方,即唐长安皇城朱雀门外、号称天街的朱雀大街两侧的相同位置,左右对称,占地面积基本一样。东、西两市形成了唐代长安城的商业格局。东市、西市还引出“买东西”之说,为什么不说“买南北”呢?用五行说解释,因为东西属金木,可以买卖;而南北属水火,水火无情,不能买卖。不过,“买东西”的说法在唐以前可能还没形成,因为北朝民歌《木兰辞》有:“东市买骏马,西市买鞍鞯,南市买辔头,北市买长鞭。”

大唐之东市,是长安城中手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的两大中心之一。这里商贾云集、店铺毗连,十分繁荣。隋代称都会市,唐改为东市。《长安志》载: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,四面立邸,四方珍奇,皆所积集……”东市内街道两侧不仅有笔行、酒肆、铁行、肉行、麸



行、绢行、药行、乐器行、雕版印刷行、金银行等,另有赁驴人、买胡琴者、杂戏、琵琶名手、货锦绣财帛者……《唐代长安词典》载:“市内又有很多专供中外客商寄存和出售货物的邸店和饮食摊点、旗亭酒肆、旅社宾馆等。此外,还有不少居民住宅。东市署位于该市中心,次东为平准局。佛教寺院资圣寺在市内西侧,西北街为刑人之处。”

昔日大唐东市位于长安城东,西接平康、宣阳二坊,东连道政、常乐二坊,北邻胜业坊和兴庆宫,南和安邑坊、亲仁坊相接(即东接今天的西安交大西侧,南联友谊东路,西临安西街东侧,北挨咸宁西路)。“南北居二坊之地”,曾是一座封闭式的小城,东西南北各长600步。四面各开2门,共8个门,可称唐长安城的城中之城。四条大街在东市城中交叉成“井”字形,把东市划分成九个方形区域。东北隅有

代大诗人白居易,千年之前就曾居住在紧挨乐居场东边的常乐坊,取常乐坊的“乐”字,白居易的“居”字,正好配成今日“乐居”二字。虽然无稽,但亦有趣。

东市靠近三大内,周围多是勋贵官僚的豪宅,例如发动“安史之乱”的罪魁安禄山,与平定“安史之乱”的中兴名臣郭子仪,这一对生死冤家都住在西南角的亲仁坊;唐高祖李渊的岳父窦毅、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、哥哥杨国忠,以及李林甫、李德裕父子,还有书法家褚遂良、诗人贺知章、柳宗元等的宅第,均在东市附近。故市中“四方珍奇,皆所积集”。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载,武宗会昌三年,“夜三更,东市失火,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,官私钱物金银绢药总烧尽。”

然而,东市商业反而不如西市繁荣,这是因为

唐代重农抑商,视商贾为“贱类”,以工商为末利,朝廷严禁百官入市。贞观元年(627)唐太宗就多次颁布禁令,据《唐会要》卷八六记载:“贞观元年十月敕:五品以上,不得入市。”《新唐书·太宗纪》载:“禁五品以上过市。”《新唐书·德宗纪》大历十四年六月,德宗又下诏:“禁百官署邸販鬻。”另外,《朝野金载》卷四记载:武周时期官张衡,令史出身,位至四品,将入三品。一次退朝,在路旁买一新熟蒸饼,于马上而食,结果遭御史弹劾,而未能升迁。武则天特为降敕:“流外出身,不许入三品。”可见统治者严格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,对工商业限制、打击,全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的小农经济,以确保赋役征派、地租征收,巩固政权。当然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官商勾结,官员依仗手中的权力获得利益。

大唐东市众多遗迹的

开掘,可以看出,1400多年前唐代东市的布局确实是九宫格局,两纵两横4条主干道,且商户基本是前店后坊,极具特色。这里还发掘出了唐代道路、水沟、木桥、作坊、窖井、渗井、泥池、陶瓷坑、玉器和骨器加工地点等遗迹;出土了唐代砖瓦、陶瓷残片和三彩器、铜器、玻璃器、宝石戒面、开元通宝钱币等文物。尤其是发现了井深均在3米左右的3口水井,2口都用砖砌过且井底平铺有砖。看来,当年东市范围的地下水相当丰沛。更令人惊讶的是,在出土的一个唐代遗留的瓷壶的底部写着“×家酒店”四个字,让人真有点穿越的错觉,唐代竟然已经有了现代“酒店”之称呼……

大唐西市的原址重建项目,走在了前边。如今的西安,如果有西市而无东市,那就“东西”不全,让人深感遗憾啦!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